

群众运动与阶级意识: 1959 年贵州的整社运动

井 方 王瑞芳

摘 要 贵州整社运动是带有强烈阶级意识的一场群众运动。它主要通过鸣放、批判和整改三个步骤逐步展开,通过揭露问题以甄别和清理阶级异己分子,让农民心悦诚服地进入公社体制之中。整社运动没有从公社体制本身寻找原因,而是认定农村中有“阶级敌人”阻挠和破坏,因而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群众运动来解决公社存在问题的基本思路。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公社体制问题,是整社运动失误之根本原因。

关键词 整社;群众运动;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3492(2016)05 - 0086 - 06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对公社所有制、分配制以及管理制度进行整顿。其中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中的“整社”最为突出。根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整社”是对公社进行教育、整顿和巩固,旨在巩固公社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跃进,采取“政治挂帅”,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鸣放和批判活动,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以转变干部作风。^{[1] [P319-320]}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整社内容开始涉及所有制和平均主义等问题。毛泽东认识到应从“所有制”方面着手解决,^{[2] [P9]} 并对平均主义作了批评,认为共产风“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2] [P12]} 贵州省委在整社问题上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并在《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认为对公社看法参差不齐甚至有“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3] [P372]} 故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贵州省在所有制、伙食、包产^{[4] [P97-102]} 等问题上的意见。1959年11月,贵州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部署农村整社整风运动,规定批判对象是“右倾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性质上“仍属内部矛盾范畴”,不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5] [P182]} 因贵州整社运动在当时具有全国性的典型意义,故对其基本步骤、基本做法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揭示全国整社运动的诸多面相,揭示中共发动群众运动与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联。

一、整社运动的基本步骤

从1958年底贯彻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到1959年全年,贵州省委始终将“整社”作为公社工作的重点,这从当时制定的诸多文件及《贵州日报》的密集报道中可见一斑。通过分析贵州省委给中央报告及

作者简介:井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大学讲师;王瑞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相关文件,可以梳理出贵州整社运动的大致情况。

从1958年年底开始,贵州全省各市、地、州、县委和部分公社党委组织工作组先后进行整社运动。到次年年底,全省各地、州、市共组织7个整社试点,共128个生产队、2.6万多户,近12万人。重点批判的面控制在1%以下,7个试点公社共批判743人,占总人口的0.64%。整社取得了良好效果,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17%—60%以上不等,工业总产值增加30%—50%。凯里县炉山人民公社整社后获得了“四丰收”,即“思想插上红旗、生产全面跃进、生活照顾周到、各族亲如家人”。^[6]公社社员支持和拥护人民公社,热情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据贵州省委向中央报告时强调:农村中确实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一小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和干部中的少数代表富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公社化运动中党的工作中个别、局部、暂时甚至已经克服的缺点,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法,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他们硬说:人民公社搞糟了,还不如单干;大跃进是大跃进,叫嚷土地下放、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等。^{[4](P1-4)}该报告将干群对公社的态度进行了详实报告,并将“干劲”和“政治态度”作为主要标准加以区别(参见表1)。

表1

公社名	标的项	对象	总人数	干劲足		干劲一般		干劲不足			
都匀墨冲公社	“干劲”,即干劲是否足	小队长以上干部	655人	341人	52.81%	205人	31.3%	109人	15.89%		
公社名	标的项	对象	总人数	坚决拥护		基本拥护		落后动摇		一贯反对	
安顺市华严公社、铜仁县谢桥公社、修文县阳明公社3个社	政治态度,即是否拥护社会主义	党、团员和生产队、小队的干部	503人	246人	48.91%	140人	27.79%	73人	14.6%	44人	8.7%
铜仁县谢桥公社、修文县阳明公社、凯里县凯里公社等社共11个生产队	同上	群众(未分阶级成分)	2321人	1171人	50.45%	668人	28.78%	342人	14.74%	140人	6.03%

据贵州省委向中央报告总结说: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极为深刻尖锐的,在当前农村中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整风整社运动是十分必要的。^{[4](P2)}贵州省委反映的这种现象,在全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1959年10月底,南京市委书记向从北京南下视察的毛泽东报告说,南京附近郊区农村干部“比较坚定地拥护党的决定、号召的,占41%多点。”毛泽东指示“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阶级不消灭,这个问题总是存在。”^{[7](P277)}可见,从地方到中央均认为公社遇到的阻力和部分农民反对公社是农村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

贵州“整社”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步骤:鸣放、排队和总结教育。

第一步是“鸣放”,即开展“两条道路”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活动,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揭露矛盾。刚开始进行鸣放时,部分干部群众有顾虑,怕辩论,他们说:共产党惯用软索套猛虎。贫农、下中农有的则怕打击报复,有的抱着无所谓态度。该报告认为,“须充分发动群众,造成适当的温度,搞几个高潮,才能放得充分,真正做到畅所欲言。”经验包括:讲清政策,解除顾虑,充分发动群众;党、团、干、群一起鸣放,为解除群众的顾虑,往往干部首先带头鸣放,“干部向群众表态,并主动检查自己,带头参加鸣放”^[8];提出适当的题目,引导鸣放;形式多样化,利用大会、小会、工地、田间、家庭会、个别摆谈,充分鸣放,如贵阳花溪公社“召开田间管理现场会,做到了整社、生产两不误”^[9];结合整改,能改的立即改。^{[4](P2-3)}镇远县舞阳公社前进生产队上中农邓某提出“七大紧张”(粮食、油料、猪肉、糖食、酒、劳力、人心),“三大困难”(大跃进、国家建设、工农联盟),“两整”(国民党整新兵,共产党整农民),“两不要”(政府不要农民,农民不要政府),因此,他叫嚷“四下放”(田土、耕牛农具、食堂、生猪),“将军跳下马,各自奔前程”。^{[4](P3)}整社运动中7个试点共鸣放出各种意见118050条,其中正确、基本正确的占66.4%,错误和

误解的占 18.3% ,攻击的占 15.3% 。攻击言论包括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政策、公共食堂、供给制、农业“八字宪法”、工农关系、干部作风以及经济工作等,而攻击最多的是粮食问题。其本质是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搞垮人民公社,使资本主义复辟。

第二步是“批判”。根据鸣放阶段所揭露出来的问题,组织“大辩论”,分清大是大非,把“富农资本主义思想”批深批透,搞臭搞彻底,提高广大社员的觉悟,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这是整社工作的关键阶段。一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党、团、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组成一支“战斗队伍”。整社队伍的骨干“依靠党、团、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着重考虑他们的阶级出身,注重从那些阶级出身贫下中农社员中培养和选拔整社队伍。而确定重点批判对象,往往是在鸣放时,起来反映公社问题的干部和社员。如对镇远县舞阳公社前进生产队上中农邓某的批判。后在 1962 年甄别平反工作中认为整风整社是必要的,“但有扩大化的毛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10][P2]}二是抓住重点批判对象的主要观点,算账对比,揭老底,挖根子,彻底批驳“谬论”,并允许对方说理,使之心服口服。如都匀市墨冲公社富中农王某说“农民生活不如过去好”,“你们收入有增加,我的收入年年减少了”。后来大家算了全队吃粮、吃盐、穿衣八笔大账,又算了他自己的收入账,由他自己报给大家算。他家解放前 1949 年,每人收入合 50 元,解放后单干时 65 元,1956 年达 72 元,1958 年 75 元,今年达到 90 元。他低头认输了。毕节县海子街公社富农周某说“共产党像孙悟空一样有 72 变,弄得人民团团转。”辩论中总结十年来的变化“奴隶变成了主人,贫穷变成了富裕。”^{[4][P3~4]}三是举办展览,组织参观,现场辩论。用形象直观的“事实”来反驳谣言和不实之词,以教育群众。安顺华严公社展出全社生产生活变化的图表、照片、模型和实物,典型户新旧生活对比实物。此外,还组织实施参观,参观社办厂矿、场站、水库、新居民点和敬老院、托儿所、公共食堂,使广大社员看到人民公社的美好远景。当时这在全国是具有普遍性的做法。如镇远舞阳公社前进生产队在批邓某时,在他家里开了现场辩论会。邓某家解放前是烂草房,生活也不够好,现在有三间大房子,有花条被,新衣服,全家穿上新胶鞋。贫下中农对他所说的“七大紧张”逐条进行批驳,又算了全队全年卖粮 62 万斤,猪 227 头,共折款 45698 元,超过农民支援城市的总金额 7153 元。最后,邓某某心服口服,说“自己瞎了眼睛。”^{[4][P4]}四是大会辩论,小会教育,关于土地、家庭等等,个别教育,反复辩论,辩深辩透。7 个试点共重点批判 743 人。被批的人一般 80%—90% 以上口服心服,并在实际行动上有所转变。如墨冲公社被批富农曹某说“这样的辩论会,合理合法,叫人输理又服气,保证以后跟着群众走社会主义。”被批判的党员罗某说“感谢党对我的教育,把我从粪坑里拉出来,以后就是死了也要听党的话。”能让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不高的农民有这样的觉悟,足见当时中共教育农民之深入和乡村治理之扎实。

最后一步是进行整改。在重点对象被批判结束后,各地总结经验,在群众中开展“正面”宣传教育,组织群众进行专题辩论,划清大是大非界限,提高群众的觉悟,并着手整顿改进。据贵州省委向中央报告:整社取得了效果,农村中一部分富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被打退了,资本主义各种谬论被搞臭了,资本主义思想活动市场大大缩小了,农民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农村的政治局面和生产运动呈现了一片崭新的景象。据铜仁地区对几个公社各阶层群众的分析,坚决拥护(基本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由原来总人口的 80% 增加到 90%;落后动摇的由原来的 14% 缩小到 8%;反对社会主义的由原来的 6% 下降到 2%;劳动生产率由原来的 60%—70% 提高到 90% 以上。^{[4][P4]}当时报纸纷纷报道省内各地整社方法和经验。如凯里县公社“开展鸣放辩论推进整社工作”^[11];三穗县公社“举行各种现场会议,运用参观评比的方法”^[12]来推动整社工作;都匀红光人民公社“贯彻了群众路线,以生产为中心,与分配、生活、思想等工作相结合。”^[13]

二、整社运动的基本做法

通过对贵州 1959 年整社运动的初步考察,可以总结出当时全国整社的一些基本做法和基本模式。从阶级意识、群众运动及策略问题三个关键词中,能够感受到整社运动所体现出的那种强烈的阶级意识。

(一) 技术式整顿和阶级斗争同步进行

所谓技术式整顿,就是从公社本身找原因;而整社的实际做法则开始诉诸阶级斗争。虽然公社化运动的确存在着蓄意反对公社的情况,但大部分农民是拥护公社的。他们抱着美好的愿望加入公社,即使在后来公社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农民对公社有所怀疑的情况非常复杂,应作具体分析。当时农村反对公社体制的主要有四种人:一是认识到公社的体制性问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对公社管理有怀疑,指出公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有的意见可能很尖锐,为此一些人受到错误批判;二是公社化以后受平均主义影响而利益受损的新富农、新中农等;三是腐败变质的基层干部,表现为贪污、多拿多占等;四是确有历史问题的阶级异己分子,如国民党旧军阀、土匪、汉奸、伪保甲长等,他们潜伏起来、伺机作乱。所以不能笼统地将反对人民公社等同于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党的领导。

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看来,整社运动基本解决了公社存在的问题,公社体制本身没有问题,而问题就出在农村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农村存在着破坏公社的“阶级异己分子”,故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清除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公社存在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庐山会议后全党转向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埋下了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党内的种子。”^{[14] (P612)}这个转向是与公社化运动中的矛盾紧密相连的。以阶级斗争方式进行整社,主要是基于对人民公社内部矛盾的错误判断所致,而这种错误判断又源于中共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农村在经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中的地主阶级被消灭,富农阶层被削弱,正如邓子恢所言“中国的富农经济在土地改革以前,就不是那样大,就不是那样很发展,在土地改革当中,老区把富农斗光了,新区又把他们的封建尾巴割了一下,搞得相当厉害,现在富农的油水不多了。”^{[15] (P258)}农村虽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但并非主要矛盾。整社运动不是从公社体制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有“阶级敌人”在阻挠和破坏公社体制,进而把解决问题的矛头转向了阶级斗争。这种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使革命者保持敌情意识和清醒头脑,其功不可没,而在和平建设年代则会带来消极影响。正因整社运动是带着阶级斗争的先占性意识导向展开的群众运动,故导致了一种偏向:强调以大鸣大放和批判教育的方式,弱化了以调查研究方法掌握真实情况的工作方式。主观上首先认定某种“存在”而后找具体“事实”加以去验证,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方法。这个方法显然背离了毛泽东本人所强调的认识论原则。

(二) 整社与群众运动紧密相连

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整社,是“大跃进”前后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方式。贵州省委将“下最大决心,大搞群众运动整社运动”作为整社运动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便是明显的证明。“群众运动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革命及生产活动。”^[16]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17] (P298)}故它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董必武指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群众运动,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比如土地改革,仅仅靠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一个法律而不动员人民群众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得比较彻底。”^{[18] (P340)}像建立人民公社这样深刻的制度变革,不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容易搞起来的。但群众运动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相应地改变。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

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19] (P253)} 但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反而逐渐强化,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有人指出,“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20] 毛泽东多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邓小平则指出“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21] (P294~295)} 群众往往是被裹挟到群众运动之中的。当群众运动无法解决公社存在的现实问题时,人们自然会对群众运动方式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群众运动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中批评说“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19] (P404)} 整社运动中便存在着这种“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

整社运动以农村存在阶级斗争为基本假设,对公社本身出现的问题“不是从公社的体制本身去找原因,而是利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去看待和分析农村的形势,”^{[22] (P169)} 这使得纠正公社体制的错误变得异常艰难。贵州整社中的群众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以“四大”为武器,已经有了过火倾向。这种做法既解决不了公社体制存在的实际问题,还加剧了干群之间、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整社运动中对村干部和部分村民的批判,希图让人“心服口服”,实际上是难以真正做到的。表面上的“心悦诚服”往往是受到政治高压下的口是心非,因为公社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三) 整社运动实施三步走“策略”

贵州整社分鸣放、批判、整改三个阶段,整改是整社的目标,旨在把人民公社办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整社中出现的偏向主要集中于鸣放和批判阶段。所谓鸣放,就是有意鼓动和诱导人们说出心里话,把对公社的意见、不满和批评说出来,“造成适当的温度,搞几个高潮,真正做到畅所欲言”。随后“当着鸣放达到一定温度时,牛鬼蛇神就上了台。”制造出一种兴奋、高涨的氛围,再进行重点批判。公社化运动初期因大刮平均主义“共产风”,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公社有不满情绪是正常的状况。大家借整社“鸣放”之机将怨气说出来,然后再投入生产中去,是比较合理的事情。但问题就出在鸣放之后的批判阶段上。批判对象主要是那些在鸣放过程中表达不满和提出意见的人。如镇远舞阳公社批判前进生产队村民邓某时,是在他家里开现场辩论会,这在当时是相对温和的。有些地区的“辩论会”形同于“批斗会”,大搞人身攻击,更有打伤人甚至打死人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恐怖氛围下再没有人敢讲真话,进而造成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等许多不良风气的继续蔓延。这种先引导人说实话,再进行批判的做法,是整社运动的基本“策略”,在当时是较为普遍被人采用的。

三、阶级意识与群众运动的关联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均与强烈的“阶级意识”紧密相联。这种阶级意识仿佛是内嵌在了人们头脑中的先占性意识,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意识。所谓阶级意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阶级身份意识,即你是哪个阶级出身;阶级区分意识,你的言行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二是阶级认同意识,同一个阶级天然能够联合起来。所谓先占性意识,就是人们无论看什么问题均不自觉地“把‘阶级意识’放在眼前,如同戴着‘阶级’的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一样。”

阶级意识与群众运动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只有将这种意识付诸群众性社会实践时才会发生关联。这种群众性社会实践,首先表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成立人民公社。但当人民公社普遍建立后,因公社体制超越了生产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及出现了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极“左”做法,故公社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面对公社面临的困境和出现的问题,上级认定不是公社体制本身的

问题,而是农村中有“阶级异己分子”(包括一些变质干部)的反对和破坏,因而有必要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批判等群众运动的方式,对所筛选出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批判和斗争。这样,从群众性社会实践开始,中经唤起阶级意识及进行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达到巩固人民公社这种新体制的目标。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遂成为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有效方式。这样看来,整社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意识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环节:农村大搞群众运动——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遇到严重困难——认定农村有“阶级异己分子”搞破坏(阶级意识觉醒)——大搞群众运动筛选出这些坏分子并进行批判斗争(群众运动)——继续推进公社前进。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上级认为公社出现的问题是农村“阶级敌人”搞破坏所致,而没有从公社本身的体制性方面寻找原因,故形成了采取阶级斗争方式进行整社的基本思路。

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信念,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信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23] (P143)} 唤起阶级意识而进行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也是中共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强烈的阶级意识使中共时刻不忘自己的阶级身份,不忘自己的理想宗旨。依靠农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基本上没有受到农民习气的影响,显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这种阶级斗争仅仅存在于特定条件下的特定范围,不能将其绝对化和扩大化。贵州整社运动所采用的以阶级斗争方式推行群众运动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并没有根本解决公社体制所暴露出的问题,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对如何认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编写委员会编.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第一辑[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 [4]中共贵州省委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规定和重点整社工作报告(1959年1月-1959年12月)[Z].贵州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1977.
- [5]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当代贵州大事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 [6]炉山公社整社获“四丰收”[N].贵州日报,1959-3-24.
-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8]整社四件宝:鸣辩改建[N].贵州日报,1959-1-14.
- [9]张梦迎.等.花溪公社整社推动了生产[N].贵州日报,1959-1-12.
- [10]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监委关于甄别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2年6月21日)[Z].开阳县档案馆(局)藏档案号:1-1-415.
- [11]李延斌.向党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N].贵州日报,1959-1-4.
- [12]现场会推动整社:瓦寨公社以点带面、互相促进的方法好[N].贵州日报,1959-12-24.
- [13]中共黔南州委农村工作部.以生产为中心,从收益分配入手[N].贵州日报,1959-12-31.
-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 [15]邓子恢.邓子恢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6]韩振海.试论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J].社会主义研究,1994(4).
- [17]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8]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9]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0]赵汀阳.改革:怨恨挡不住诱惑[J].商务周刊,2008(5).
- [2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2]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贺永泉